

# 不同的表象，相似的本质——浅议文艺复兴与“五四”运动时期文学翻译活动的相似性

徐明炜

(湖南大学外国语与国际教育学院, 湖南省、长沙市, 410082)

**摘要:** 欧洲文艺复兴和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为了传播新的思想和文化, 为各自的社会变革做铺垫, 都进行了大量的文学翻译活动, 在中西翻译史上形成了两个翻译高潮, 为各自的思想传播、民众启蒙和社会变革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鉴于两次翻译高潮在时空、文化、社会背景等的不同, 本文运用描述性研究方法, 以多元系统论为理论基础, 从对人文主义的关注、民族语言/白话文的使用和社会功能三个方面对两次翻译高潮的相似之处进行了初步探究。

**关键词:** 文艺复兴; “五四”运动; 文学翻译; 相似之处; 多元系统论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 0 引言

欧洲文艺复兴的核心主题是人文主义精神, 倡导人性的解放, 反对封建体制和教会的黑暗统治与压迫, 而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主题是民主科学与民族救亡, 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但是这两个时期均涉及大量新思想的广泛传播, 以及民族语言(文艺复兴)和白话文(“五四”运动)的快速发展, “五四”运动时期也因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估量以及对白话文学的发展等而被胡适(1985:267)、蔡元培(1984:421-422)等学者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

针对这两个时期的对比研究主要集中于历史、文化、政治等方面, 而鲜有涉及两个时期文学翻译的对比研究。实际上, 为了传播新的思想和文化, 为各自的社会变革做铺垫, 这两次文化运动期间都进行了大量的文学翻译活动, 分别在中西翻译史上形成了两个翻译高潮, 为各自的思想传播、民众启蒙和社会变革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早在20世纪20年代, 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和教育家蒋百里(1921:69-78)就已对这两个时期的文学翻译活动有过研究, 并举文艺复兴文学翻译之先例供国人学习。蒋认为, 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事业“有特别之二事与中国现代有共鸣之致”: “当时之翻译事业含有主义运动之色彩”, 并“与国语运动互相为表里”。(1921:70-71)

由埃文-左哈尔(Even-Zohar)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多元系统论将翻译研究纳入社会与文化研究的范畴。多元系统论将翻译文学看做是译入语文化内社会、文学、历史等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并与其他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Munday, 2012: 175) 鉴于两次翻译高潮发生在不同的时空、文化、社会背景中, 无论是翻译目的、翻译选材, 还是翻译策略都各不相同, 因此, 本文以多元系统论为理论基础, 结合两个时期的社会背景, 运用描述性研究方法对两次翻译高潮的相似之处进行了初步的对比研究。

### 1 对人文主义的关注

13世纪末, 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崩溃; 14世纪, 教廷由意大利迁至阿维农。倡导理性和现实的古典思想开始在摆脱皇帝和教皇两大封建势力直接控制的意大利更加自由地蔓延开来, 自十字军东征时期发展起来的商业迅速发展, 再加之优越的地理位置, 14世纪的意大利成为欧洲最富有、最发达的地区, 工商业和银行业均领先于其他欧洲国家。这就意味着与传统封建势力相对立的新型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的力量强大起来, 他们需要新的意识形态来对抗宗教和封建统治, 维护其自身利益, 这个时候, 重视理性与现实、强调以人为本的人

人文主义逐渐走进他们的视野，并在其大力支持和倡导下迅速萌芽、发展，最终成为整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核心思想。

所谓文艺复兴，本质上就是源于古希腊罗马的以人的经验为基础的基本理念的复兴，即人文主义的复兴。其主要内容就是“以人”为中心。人文主义提倡人性自由，强调人的主体性和个性发展；提倡理性，主张探索自然，欣赏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以神为中心，反对封建特权的等级制度，否定对罗马教皇和天主教会的绝对服从，蔑视宗教权威，倡导摆脱神学束缚，关注人性的张扬。因此，这个时期翻译活动的主要目的在于研究和复兴古典文化，传播以人文主义为中心的新文化、新思想。

作为最重要的主流翻译之一，《圣经》的翻译最直接地体现了人文主义者们对人的主体性的提倡和对教会的反叛。当时的《圣经》解释权集中在教会手中，平民百姓甚至没有自己阅读《圣经》的权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译者们或是用通俗语言翻译《圣经》以便广大平民传阅，如德国的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或是强调正确理解和解释《圣经》，如德西德利乌·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 1466?—1536）。总的来说，这个时期《圣经》翻译的目的就在于挑战教会对《圣经》的解释权，站在“人”的角度解释《圣经》，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教会的统治和权威，凸显了人的重要性，推动了《圣经》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播。在其他文学作品的翻译上，除了翻译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经典并藉此反对教会的宗教桎梏、宣扬理性和个性解放，如塞巴斯蒂安·布兰特（Sebastian Brant, 1457—1521）译古罗马诗人卡托的教谕诗集，伊拉斯谟译里巴尼乌斯（Libanius, 314—393）、琉善（Lucian, 125?—200）、欧里庇得斯等的古希腊文学作品，马丁·路德译的《伊索寓言》，雅克·阿米欧（Jacques Amyot, 1513—1593）译的古罗马希腊语作家普鲁塔克（Ploutarchos, 46?—120?）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简称《名人传》），以及托马斯·诺斯（Thomas North, 1535?—1601?）的《名人传》等，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作品也是各国译介的重点，如批判中世纪蒙昧主义、颂扬文化知识和人的才能与智慧的《神曲》，以及批判宗教守旧思想，主张“幸福在人间”的《十日谈》。简而言之，人文主义自14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始时期的萌芽，到15世纪在城市的发展，最后再到16、17世纪的鼎盛和后期，其在欧洲实现了由萌芽到鼎盛、由点到面的快速发展，而文学翻译对于人文主义在欧洲各国和地区的广泛传播所起到的作用则是不可忽视的。（刘明翰，2010：51-2）

在中国，面对外来列强和近代工商业的冲击，传统儒道文化已然难以继续维持其在封建社会中的统治地位，其思想与信仰也面临着随时被推翻或否定的危险。经历了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等一系列失败的“改制”之后，“五四”时期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鲁迅等人为首的知识分子开始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向国人宣传人文主义，想要唤醒国人的“人文觉醒”。他们以“民主”反对封建专制，以“科学”反对愚昧迷信，以“新道德”反对“三纲五常”的旧道德。他们呼吁“人权”、“民主”、“自由”，通过怀疑和批判来重新估量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试图建立新的文化体系，反映在文学上就是以“新文学”反对陈腐的旧文学，以白话反对文言。而要建立新文学，首先就要引进新的文学形式，翻译无疑就是最重要的工具。“五四”时期，以《新青年》、陈独秀、胡适等为代表的翻译团体或个人强调翻译选材重点是“名家名著”。从罗家伦与胡适合译的《娜拉》到郭沫若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再到胡适的《老洛伯》、刘半农“灵霞馆笔记”、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等等，不论是译介的内容还是翻译用语，无不体现出对人的独立和自由的宣扬与追求。

不可否认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并不是彻底地反对宗教，相反地，很多人文主义者也是宗教的信仰者，但是他们强调人的主体作用，反对中世纪对宗教教义的扭曲与滥用，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具有突破性意义的；而“五四”时期的人文主义则完全与宗教无关，其反抗的是儒家思想中限制人的自由与权力的部分。但是在对人文主义（或者说对“人”）的重视和传播这一点上，这两个时期的翻译活动的作用是相同的：他们都致力于对人的关注

以及对人性解放的宣扬，并期望藉此推动社会的进步。这也是翻译的认知和交流功能以及对社会进步的促进功能的体现。

## 2 采用相似的语言策略、

解放语言是对“人”的关注最重要的表现之一，无论是文艺复兴时期各国由拉丁语到民族语言的过渡，还是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文言到白话的逐步转换，无不体现出人文主义对人，尤其是对普通民众的关注与重视。

### 2.1 文艺复兴：使用民族语言

自中世纪起到15世纪，拉丁语作为官方语言、贵族语言，以及高等教育语言，在欧洲一直处于统治地位。意大利文艺复兴伊始，以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为首的人文主义者们开始尝试用本族语言甚至方言创作。

但丁是第一位用俗语写作，提倡发展意大利口语并极力赞扬各民族语言优点的文人，他于约1304-1307年间用意大利语写就了《飧宴》(Convivio)，并在其中写道：“拉丁语只给少数人以利益，俗语其实是为多数人服务”。(杨慧林，黄晋凯，2001: 274)虽然但丁认为拉丁语因其恒定性、丰富的词汇以及对规则的严格遵循而比俗语优越，但是俗语普及广泛，用俗语写作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向大众推广和普及文化知识，而且同样可以用于表达崇高和新颖的主题。在此后的《论俗语》(De vulgari Eloquentia)中，但丁论述了意大利俗语的起源，并称俗语(volgare)比拉丁语(gramatica)更高贵。(但丁，1998)他“打破了视拉丁语为唯一文学语言的成见，率先肯定俗语作为文学语言的价值”，提出要树立对意大利俗语的信息，摆脱对外国语的(法语和普罗旺斯语)的依赖，这积极推动了意大利俗语的发展。(刘耀春，2005)继但丁之后，意大利的彼特拉克、薄伽丘，法国以杜贝莱为首的七星诗社，英国的乔叟以及德国的马丁·路德，均为推动本国或本民族语言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文艺复兴并不是俗语翻译的开端，但在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文艺复兴的风潮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之后，译者们普遍认识到了语言之间以及原作和译作之间的差异，不再一味地追求用译入语再现拉丁语等的风格，开始重视民族语的风格特点及其独有的规则和用法。许多译者，如多雷、路德等，都强调在准确理解原作的基础上用本国语言忠实再现原作的内容和风格。到16世纪，各国的本族语言已经开始逐渐替代拉丁语，成为创作和翻译的重要用语，而这与用本族语言进行的翻译活动是密不可分的。以英语为例，文艺复兴时期，英语结合自身的语言特色，借鉴和吸收了大量的外来词汇，尤其是拉丁语与希腊语词汇，越来越多的英国学者和作家开始使用英语进行创作，如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等。拉丁语作为学术语言和书面语言的统治地位开始瓦解。此外，始于16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以及《圣经》英译本的出现(尤其是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译的《圣经新约》，以及英王詹姆士一世主导下的《圣经钦定本》)也使得无论是贵族、学者，还是普通百姓，都开始意识到作为本族语言——英语的端正与神圣，从而进一步加快了英语地位的提升与发展。不论是世俗文学还是神学用语，英语开始逐渐在各个领域取代拉丁文。再如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翻译家雅克·阿米欧(Jacques Amyot, 1513-1593)，他在用法国俗语翻译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Plutarch, 约46~120)的《名人传》时，不仅创造了大量新的政治、教育、哲学、科学、音乐等领域的词汇，还从希腊语和拉丁语借词，从而大大丰富了法语词汇，为法语的纯洁化和标准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谭载喜，2010: 70)

日益繁荣的民族语翻译以及创作反映出来的不只是在人文主义关怀之下对统治权威的一种挑战，也是该时期民众的民族与国家意识的增强。意大利从中世纪的城市，逐渐发展成为独立自主的城市共和国，而15、16世纪的英法等国或是君主专制得到巩固，或是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民族意识进一步加强，对于民族统一与独立的欲望愈加强烈。作为思想表达工具的语言，必然应于这一趋势相适应，因此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学也日益受到重视。民族语言的使用将各个国家或民族与其他国家或民族分离开来并至少在语言使用上成为一个独立

的整体，也预示着各国家或民族的民族文学的发展与繁荣。除此之外，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也需要拉丁文以外的语言作为其与传统贵族统治以及宗教社会对抗的武器。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其远低于贵族阶级的社会地位及创新的思想意识注定了其与封建及宗教统治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他们需要话语权来表达自己的诉求，而作为官方与宗教语言的拉丁语显然不合适。因此，民族语的发展也获得了资产阶级的支持。

## 2.2 “五四”运动：使用白话文

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两条主线，一条是思想运动，一条是文化运动。两条线路相辅相成：思想运动是文化运动的基础，文化运动是思想运动的表现。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是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而两者分别对应的文学语言就是白话文和文言文。白话是汉语书面语的一种，但五四之前主要是用于通俗文学，如明清小说，是以汉语口语为基础，经加工而成的一种书面语。白话文通俗易懂，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文言则是以先秦和两汉时期的汉语口语发展而来的书面用语，讲究骈骊对仗、音律工整。“五四”新文学运动期间，以胡适为首的新一代知识分子纷纷把矛头指向陈腐的文言文和旧文学，呼吁使用日常语言作为文学用语，通过外国文学的译介学习新的文学形式和表达方式。白话文翻译也是“五四”翻译的一个标志。1917年以前，文言翻译一枝独秀，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作为新文化运动标杆的《新青年》在创刊后的最初两年里刊发的翻译作品也皆为文言翻译。1917年1月1日，《新青年》二卷五号刊登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则在随后的六号上回应胡的《刍议》，发表《文学革命论》，至此，五四新文学的大幕拉开，提倡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文学革命也正式开始。1918年1月起，《新青年》全刊使用白话文，此后几年的时间里，白话文逐渐在翻译、创作与批评中占据主导地位，以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为代表的著名译者也纷纷由之前的文言翻译转向白话翻译。在胡适、陈独秀、傅斯年、周作人等人的推动下，白话文运动开始展开，在翻译和创作等文学活动中，白话文开始逐渐取代文言文，成为新的文学表达工具。尤其是在胡适的白话体诗《老洛伯》之后，翻译家们开始纷纷效仿现代诗歌，并逐渐接受用白话文翻译诗歌，诗歌翻译开始向现代化转变。正如廖七一所言，诗歌翻译白话化标志着文言翻译退出文学翻译主流，白话取而代之，成为正宗的翻译用语。（廖七一，2010：281）。大量的词汇、新的表达方法等被引入白话文，丰富了汉语和文学话语，从而丰富了文学创作用语。白话翻译与创作相互影响，促进了现代汉语的形成，中国文学创作也进入白话文时代。

白话文翻译之于新文学和现代汉语语言革命的重要性，用胡适的话说就是：“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数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他主张“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陈独秀也提出当下“宜翻译不宜创作”。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们希望借助于文学与文学翻译向普通大众传播平等、自由、民主等人文思想，所以用人民的语言，即白话文进行创作与翻译就成了必然要求。（任淑坤，2009：128）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两个时期的文学翻译活动对语言革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都体现了文学与社会发展的焦点从高贵的统治阶级特权向普通平民阶级的转变，然而其语言革命背后体现的意识转变却不尽相同：文艺复兴时期及以后，各国本族语言开始逐渐代替拉丁语，反映出来的不只是在人文主义的关怀之下对统治权威的一种挑战，也可以说是该时期民众的民族与国家意识的增强。意大利从中世纪的城市，逐渐发展成为独立自主的城市共和国，而15、16世纪的英法等国或是君主专制得到巩固，或是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民族意识进一步加强，因此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学也日益受到重视。民族语言的使用将各个国家或民族与其他国家或民族分离开来，也预示着各国家或民族的民族文学的发展与繁荣。而“五四”时期的语言革命却是个人（或者说是个体）意识的彰显。“五四”运动不同于文艺复兴，整个“运动”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发生、发展，继而淡化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除了在反对列强侵略方面，它并不像文艺复兴时期一样涉及多个国家、民族或地区的政治、文化、社会和宗教背景，其关注的主要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对以及对人性自由的宣扬，其终极目标是希望藉新

文化和新思想激发和培养国人的解放和平等意识，最终实现民族和国家的进步，摆脱外来势力的侵袭与控制。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于文学翻译活动对这两个时期的语言发展的促进作用的肯定。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民族或国家意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与个体意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增强也是受益于文学翻译活动对于新的文学形式、新的文学语言，以及新的思想的译介与传播。

总的来说，中国“五四”运动时期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翻译活动推动了文学语言由高贵到普通，由权威到平民的转换。象征高贵和权威的文言文与拉丁文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而此前一直被忽视，甚至遭到鄙视的平民语言，也就是日常用语，开始崭露头角。在文学翻译活动的推动下，欧洲各国的民族语言与中国的白话文作为新文学用语逐渐受到各自所在社会的重视，并慢慢走向成熟。尽管这两个时期的语言革命体现的意识形态的转换有所不同，但是翻译作为这两次革命的推动力量，其对于语言的发展以及成熟的促进作用是相同的。

### 3 发挥相似的社会功能

翻译的社会价值和功能是由其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本质决定的，主要体现在对社会交流与社会发展方面。（许钧，2006：380）文艺复兴与“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翻译活动通过对新思想的传播和对社会改革的推动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 3.1 认识和传播新思想

翻译最初是为满足人类的交流需要而产生的。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翻译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实现不同群体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作为一种文化交流和传播方式，翻译一直都是一项认知与传播手段。许钧曾（ibid. 381）指出“翻译之于社会的推动力，首先在于其交际性，翻译开启心灵，打开思想的疆界”。翻译使得新思想、新知识在不同民族、地区以及国家的传播成为可能。在这两个时期也不例外。

人文主义的传播是文艺复兴的一个标志。在研究和传播古典文化与思想的过程中，翻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谭载喜，2010：55）该时期古希腊和罗马经典作品以及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著作的译介不仅再现和传播了古希腊罗马的精华，更使文艺复兴的精神和宗旨传播到欧洲各国，推动了各国在社会、文学、艺术、建筑和科学等领域的进步。翻译对人文主义的传播不仅体现在世俗文学中，更将人文主义融入到宗教文学中。受到人文主义影响的宗教改革家们纷纷以自己的方式重译《圣经》，并在翻译过程中践行人文主义“以人为中心”的原则。以路德的《圣经》翻译为例，用“平民的语言”翻译的《圣经》不仅冲破了教会对《圣经》的专有解释权，一定程度上矫正了被扭曲的《圣经》思想，更使得《圣经》中诸如“众生平等”等的教义在普通民众中更广泛地传播开来。

“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为配合反对封建制度与文化，宣传民主与科学等进步思想和现代观念，大量外国文学作品通过翻译进入国人的视野，各类文学流派和文学体裁被介绍进来，随之而来的则是新思潮和新文学的产生，打破了中国教育与文化停滞不前的局面。朱自清曾于1919年在《新中国》杂志上指出：“翻译是介绍外国的文化到本国来的第一件利器。”沈雁冰（1984：40）对该时期译介西方文学作品的目的有过论述：“介绍西洋文学的目的，一半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一半也为了欲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一而且这应是更注意些的目的”，“翻译文学作品和创作一般地重要，而在尚未有成熟的‘人的文学’之邦像现在的我国，翻译尤为重要；否则，将以何者疗救灵魂的贫乏，修补人性的缺陷呢？”

作为一个传播手段，“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传播给国人的不只知识，更重要的是全新的先进思想，比如人文主义精神，两性平等，自由民主，以及资本主义思想等等，它们不仅开阔了国人的眼界，更推动了在国人思想和意识上的进步，因此我们说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活动与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翻译在文化与思想传播功能上的作用是相似的。

#### 3.2 参与和促进社会改革

翻译活动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翻译的社会调适和变革功能是指人们把翻译作

为一种革新的力量，介绍本民族所没有的思想，用其改变现有的社会形态，调和社会矛盾，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韩振宇，2006）社会间的交流与借鉴要依托翻译来实现。通过翻译，各国吸收外来思想形成并最终实现本民族某些思想的发展，从而改变原有的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社会意识形态或是社会关系，协调人们的观念和和行为，使社会获得发展所需要的条件。社会变革需要文学的推动，而文学得以推动变革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译介的有助于社会变革发生的内容或形式。

文艺复兴作为一场思想和文化上的大革命，置身其中的翻译家们通过翻译将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民主和人文精神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人文主义思想进行了广泛的传播。在资产阶级萌芽的背景下，原有的腐败的封建专制注定满足不了社会的发展与要求，它们需要新的思想甚至制度来满足新兴资产阶级的需求，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要传播新的思想与文化，翻译是必需的工具与手段。经过翻译古希腊罗马的经典之作以及含有人文主义思想的作品，不仅促进了该时期文学创作的繁荣，得到广泛传播的新思想更推动了封建制度与资产阶级的融合，从思想上加快了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进程。译者们不仅仅单纯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而译介，也是为了国家或民族的发展而译介，如王佐良就曾认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家“也以翻译为国家服务，替统治者效劳。译品中历史著作的量那么大，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其中有值得英国君臣借鉴的东西。”（转引自王克菲，2001：295）

“五四”时期，翻译作为一种促进社会变革的手段的作用更加具体而突出。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腐败的封建体制，落后的科学技术，动荡不安的社会，愈演愈烈的外强侵略，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先进知识分子们纷纷开始探索救亡图存之路。鲁迅（1982：512）曾在谈自己创作小说的动因时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陈独秀（1993：159）则认为西方文豪“非独以其文章卓越时流，乃以其思想左右一世也。”这些言论说明“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延续了晚清维新改良派的目的之一：思想启蒙的工具。“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大众文学”等的出现也使得新时期的知识分子们希望传扬的启蒙思想在普通群众之间得到了更好的传播。先进知识分子们对外国文学的译介不仅扩大了国人的阅读范围和眼界，推动了中国的文学改良，更将适应社会发展的新思想以更易于大众接受的语言传播开来，促使广大知识分子和民众参与到民族救亡的运动中来。此外，该时期对国外各种思潮、流派的引进与译介，直接冲击了封建礼教和传统儒家思想（如“娜拉”热和“易卜生”热对妇女解放运动的推动），使得国人的思想与意识形态更加开放，这极大地促进了封建思想及其制度的没落，也为后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打下了基础。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是藉由翻译实现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外国文学的翻译为近代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社会到民主共和，再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思想基础，从而加快了这些变革的产生。

#### 4 结论

本文结合两次文学翻译高潮发生的社会背景、意识形态等因素，初步分析了其在对人文主义的关注与传播、对人民大众的语言（民族语言/白话文）的使用和在认知与促进社会变革三个方面的相似之处。但不同的社会背景、意识形态、时空等注定它们在微观层面上有着各自的特点与功用。本文仅从宏观层面上对其相似性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因此许多细节问题没有兼顾到，有很大的局限性，还需要深入分析。

#### 参考文献

- [1] Grendler, P. F. (ed.). 2003. *The Renaissance— an Encyclopedia for Students* (Vol. 1) [C].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ublishing.

- [2] Munday, J. 2009.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3] 陈独秀. 1993. 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4] 但丁. 1998. 论俗语(De vulgari eloquentia) [M]. 载缪灵珠美学译文集(1) [C].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5] 高平叔. 1984. 蔡元培全集: 第6卷 [M]. 北京: 中华书局: 421-422.
- [6] 胡适. 1985. 胡适的日记(上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 [7] 韩振宇. 2006. 试论翻译的社会功能 [D]. 上海外国语大学.
- [8] 蒋百里. 1921. 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翻译事业之先例 [J]. 改造 (11): 69-78.
- [9] 廖七一. 2010. 中国近代翻译思想的嬗变——五四前后文学翻译规范研究 [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 [10] 刘明翰、朱龙华、李长林. 2010. 欧洲文艺复兴史(总论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11] 刘耀春. 2005. 语言与文化: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语言问题” [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 112-122.
- [12] 鲁迅. 1982. 鲁迅全集(4)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3] 茅盾. 1984. 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 [A]. 载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 [C].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14] 任淑坤. 2009. 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研究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15] 谭载喜. 2010. 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6] 王克菲. 2001. 翻译文化史论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17] 许钧. 2006. 翻译论 [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18] 杨慧林, 黄晋凯. 2001. 欧洲中世纪文学史 [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Similar Essence behind Different Appearances: A Contrastive Study on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Literary Translation Activities in Renaissance and the May 4th Movement

XU Mingwe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Hunan, 410082)

**Abstract:** During Renaissance and the May 4th Movement, in order to spread new spirits and cultures so as to make preparation for social reformations, a mas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activities were conducted and thus formed two climaxes in the literary translation history respectively.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different factors like time, space, culture, and social background, this paper employs descriptive methods and polysystem theory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to conduct a contrastive study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ctivities in Europe during Renaissance and gives a rough analysis on the similarities of the

two literary translation climaxes, that is , the emphasis on humanism, using languages of common people and social functions.

**Keywords:** Renaissance; the May 4th Movement; literary translation; similarities; polysystem theory

**作者简介:**徐明炜, 湖南大学外国语与国际教育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翻译学。